

也來談談漢語的單音節性

唐 海 濤

每年秋季，講“中國語言學概論”時，總免不了要提到“單音節”這一特性。儘管在這個問題上頗有爭議，我還是堅持己見不改初衷，但我提到“單音節性”時，是把它跟“有聲調”，“無屈折詞形變化”，“孤立（或分析）性”連在一起說的。“單音節性”是這一組特性的一部，不能單獨剔除在外。

最近拜讀《中國語文研究》第五期中周法高先生《中國語單音節性之再檢討》一文，援引高本漢、李方桂、趙元任等中國語言學界大師的意見，對George A. Kennedy（金守拙）、John DeFrancis及荊允敬等人的論點加以駁斥。在這點上筆者完全贊同。可惜的是，周先生在文章後半却又引用了劉森所編《中國語詞彙頻率詞典》中的統計數字，並配以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籌備處對趙元任先生編的《中國話的讀物》所作分析結果，得出“如果從詞的出現頻率來說，國語中單音節詞和多音節詞的出現頻率相差不大”這一條結論。這是重又落了金守拙、荊允敬等人濫用統計方法以數量亂質量的窠臼。

現在我要強調一個主張：我們決不能只憑單音節詞的多少來斷定漢語是不是單音節語言。因為當我們說到漢語的單音節性時，我們談的是一個“性質問題”，這是“是不是”的問題；而用統計方法求得的“單音詞”的數字及所佔百分比，是個數量方面的答案，它只能回答“有沒有”跟“有多少”的問題。這兩者不可混為一談。^①

何況統計方法本身有先天的弱點，它比較適用於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領域。因為在社會科學中變項（Variable）極多，不能完全掌握控制，所以才從數學的或然率論（Theory of Probability）中發展出抽樣分析統計法。統計結果的準確度一面受資料之數量、來源、範圍、性質等因素的影響，一面又或多或少為分析方法（包括電腦程式）所左右，其精確度絕不能跟化學實驗室中的“定性分析”結果相比。^②

其實討論“單音性”而求證於“單音詞”的頗不乏其人，例如張建木的《論漢語的特性和形態問題》^③，彭楚南的《單音節語問題的實質》^④，鄭林曦的《關於漢語的詞和漢語的單音節說》^⑤三家都以漢語中的“單音節詞”及“多音節詞”為基礎，而得到不同的結論。張氏主張單音節說而彭與鄭強烈反對。這使我想起趙元任先生在一九三四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⑥。此文以英文發表，題為《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已成爲結構語言學派經典之作。趙先生此文一方面表示在人文學方面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出《易繫辭傳》）的可能，另一方面却要說明雖然“名無固宜”，可是“名有固善”（俱出《荀子·正名篇》），那就要看稱名的用意何在。

我們說漢語是單音節語，是拿漢語跟歐洲的屈折語（Inflectional languages）或中亞的黏附語（Agglutinative languages）來作比較，而顯示漢語的特性之一。縱然如彭楚南先生所說“印歐語的詞根也大都是單音節的”，但印歐語的特性在其詞形變化，單音節的詞根並不常獨自出現於實際的語言活動之中，所以不能說是單音性的。反過來說，漢語中的“多音節詞”幾乎都可以分析，可以“單音”出現。這只要看多音節詞之可以省略（即以單音節詞代替），以及複合詞的詞素與詞素之間一般可以有停頓、延長、重複、插入等變化，即可看出“音節”這一單位在漢語中的重要性。

“單音節性”不但是漢語的特性，也是漢藏語系的特性，在劉向《說苑·善說篇》中記載了一段鄂君子皙在舟中聞越人歌的故事，原辭共三十二個音節，都用同音（或音相近）的漢字紀錄了下來，其辭如下：

盪兮攄草盪予昌桓澤予昌州州饑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逾滲悝隨河湖

這首歌被譯成楚語後（劉向用漢語轉寫）成爲：

今夕何夕兮？寧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耻。

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關於這首《越人歌》，筆者曾讀過兩篇研究文字。其一爲日本泉井久之助的《關於劉向〈說苑〉卷十一之越人歌》一文^⑦。泉井氏以四字爲一句，斷成八句，先據高本漢所擬漢語上古音（archaic chinese）譯成音標，再依越南北部一種Cham語之近似音讀之，發現其意義與說苑中所載楚譯相近。因此斷定古代的越南人在春秋末期曾居住在長江下游一帶。

另一篇文章是韋慶穩的《〈越人歌〉與壯語的關係試探》^⑧。韋氏更詳細地就現代壯語中數種方言之語音、調類、構詞、語法與越人歌記音一一對照比較，而將越人歌標成雜言如下：

盪兮攄草盪予

昌桓澤予

昌州州饑

州焉乎秦胥胥

縵予乎昭澶秦逾滲

悝隨河湖

這樣就變成了一首有韻的歌詞，句中並夾雜着沒有意思的配音詞（應該說是音節，如漢樂府中“暗我”，“上留田”，“妃呼豨”之類），如此更合乎壯語的習慣及歌謠的特性，恰如楚譯中之有“兮”字。

以上兩種解釋都有很高的可信度。姑不問其在古史研究上有何意義，至少能證明越人歌的本來語言也有“單音節性”。

另一段記載見於《後漢書》卷八十六，又見於《東觀漢記》卷二十二《葑都夷》條。現在抄錄《後漢書》中記載如下：

葑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葑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讐類。居處略與汶

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並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菽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輔上疏曰：

“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今白狼王唐菽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阪，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纒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並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

遠夷樂德歌詩曰：

大漢是治，與天意合。吏譯平端。（提官隗構），（魏冒險槽）。（罔譯劉脾），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奇異。（旁莫支留）。（徵衣隨旅），（知唐桑艾）。多賜繪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邪毗緝繡），（推潭僕遠）。（拓拒蘇便），屈伸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局後仍離）。（儂讓龍洞），（莫支度由）。願主長壽，子孫昌熾。（陽雒僧鱗），（莫稗角存）。

遠夷慕德歌詩曰：

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樓讓皮尼），（且交陵悟）。（繩動隨旅），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路且使雒）。（聖德渡諾），（魏菌度洗）。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綜邪流藩），（柞邪尋螺）。（貌潏瀘灘），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菌補邪推）。（辟危歸險），（莫受萬柳）。去俗歸德，心歸慈母。（術疊附德）。（仍路孳摸）。

遠夷懷德歌詩曰：

荒服之外，土地堯堯。食肉衣皮，（荒服之儀），（犁籍憐憐）。（阻蘇邪犁），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莫碭蠶沐）。（罔譯傳微），（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觸冒險陝。高山岐峻，（蹤優路仁），（雷折險龍）。（倫狼藏幢），緣崖礮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扶路側祿）。（息落服淫），（理瀝髭雒）。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捕茆菌毗），（懷稟匹漏）。（傳言呼救），長願臣僕。^⑨（陵陽臣僕）。

這裏每句之下在括弧中所記的就是犍都夷語歌辭的漢字記音。拿它和漢譯歌辭作一初步比較，即可發現：

- 一、很多夷語與漢語同音，那一定是漢語借詞（Loan words），從這些詞的“文化性”可以看出。如“譯”，“聖”，“德”，“險”，“萬”，“荒服”（邊荒

地帶之意)， “懷”， “匹”， “傳”， “臣”， “僕” 等都是， 此外 “洛” 字， 夷音 “雒”： 洛與雒本為一字。

二、 漢語夷語間有確定對應關係的， 如： “吏” 字兩見， 夷語俱作 “罔”。“與” 字兩見， 夷語俱作 “魏”， “蠻夷” 兩見， 夷語一作 “儂讓”， 一作 “樓讓”， 而 “儂” 與 “樓” 同音。“日” 字兩見， 夷語俱作 “且”。“多” 字四見， 夷語俱作 “邪”。“向化” 一詞兩見。夷語俱作 “隨旅”。“願” 字兩見， 夷語俱作 “陽”。“肉” 字兩見， 夷語俱作 “蘇”。

三、 有些稍稍可疑的如：

“大漢” 一詞， 在 “大漢是治” 一句中， 夷語對音為 “堤官”， 而在 “大漢安樂” 一句中， 夷語對音為 “是漢”。“是漢” 與 “堤官” 諧韻， 古音可能更近， 不知這是由於夷語的自由音變 (free variant)， 還是由於記音者的疏忽。此外 “不” 字三見， “不遠萬里” 作 “莫受萬柳”， “不見鹽穀” 作 “莫陽羸沐”， “不” 均與 “莫” 相當。惟 “不從我來” 一句夷語作 “旁莫支留”， 疑此為語序不同之故， “不” 字當仍是夷語 “莫” 音之譯。此外 “無所報嗣” 夷語作 “莫支度由”， 或者夷語中 “無”、“不” 同詞， 俱音 “莫”。“所” 字三見， 夷語一作 “知”， 一作 “支”， “知” “支” 同音。惟第三條中 “所處” 夷語作 “皮尼”， 此處或因 “皮” 與 “支” 形近而誤， 或須從語詞語法上求解釋。“見” 字二見， 夷語一作 “唐”， 一作 “陽”， 當是同一夷音。漢譯 “酒食”， 夷作 “僕遠”； 漢譯 “食肉”， 夷作 “阻蘇”。此處夷音之不同， 當由 “食” 字在句中詞性不同之故。至於 “昌樂肉飛” 中之 “樂”， 乃音樂之 “樂”， 讀 “yüeh”； “大漢安樂” 中之 “樂” 則讀 “|。”， 而夷語俱作 “拒” 音。“和雨” 之 “和” 夷語作 “尋”， “寒溫” 之 “溫” 夷語作 “潯”。“潯” 與 “尋” 音同殆由 “溫” “和” 同義之故。

以上對三首夷歌作了個初步觀察， 已可顯示一事， 即漢譯歌辭中每字 (代表一音節) 均能獨立成義， 而每一有意義的漢字 (漢語音節) 即恰巧相當於夷語的一個音節 (文中以漢字表示)。這已足以證明， 自古以來， 漢語及其南方同語族的語言具有 “單音節” 的特性。

那麼對於漢語中有大量多音節詞一事， 又該怎樣解釋呢？ 我以為：

第一： 漢語中有多音節詞是一現象， 是一事實， 却不是漢語的特性。因為在這一點上漢語與非漢語並無顯著不同， 並非我們着眼所在。

第二： 漢語多音節詞的發展， 是和語音系統化有關係的。現在國語中不同的音節只有四〇五個 (根據基礎漢語所列的音節表)， 即使計入聲調的分別， 也只是一千二百多個不同的音節。(彭楚南先生說漢語約有一千三百八十個音節單位，¹⁰ 恐與實際情況不合)。以這樣少的基本音節來擔負語言交通的重要任務， 自然非大量發展多音節詞不可， 但是漢語的 “單音節性”， 並不因此或減。

第三： 當然， 我們也可採取一個調和折衷的辦法， 說漢語是一個 “基本上由單音節

詞素構成的語言”，（趙元任先生即曾作此主張）。這樣一來，爭執的兩派各得到部分勝利，於是皆大歡喜。但我個人以為，這樣的說法不合語言學界論述語言特點的習慣，而且是一種不必要的含糊。

第四：須知我們說漢語是‘單音節語’，並不排除漢語中有“多音節詞”。如果我們界定“音節”為由“聲母”、“韻母”、“聲調”三個成素合成的語言單位，那麼漢語中也包含有小於一個音節的單位。例如我們勉強表示同意時說“嗯”，這只是一個鼻音，並無口腔音相伴，而其調與四聲無一相合。我們對人或事不滿時，會“哼”一聲。這“哼”也是個送氣的鼻音。讀書時會遇見“嘖嘖稱奇”的字樣，這“嘖”字只是個舌齒爆破音，也談不上韻母和聲調，忽然覺得很冷時，我們發（應該說吸）一個“sz”的音，這音和發“思”字音時口型相同，惟一不同是向口內吸氣作聲（趙元任先生《國語入門》中曾用到此音），這些也無害於漢語的“單音節性”。此外輕音問題，及黏附字（bound word）的問題，也是反對“單音節”說者所津津樂道的。日常語言中的輕音（或輕聲，語言教科書上稱之為Neutral tone），常因人而異，所以不是必然的。國語中說“我的書”時，“的”字多半是輕聲，但廣東人說“我嘅書”，“嘅”字並非輕聲。同樣的，國語“吃了飯”，“了”字輕聲，粵語“食咗飯”，“咗”字不輕。金守拙強調“的”字“了”字不能算獨立音節，必須附着於其他音節而存在，因而是次音節，而且是沒有詞彙意義的次音節。他却不知“了”字本來有“完畢”，“了解”等意思；“的”字本來有“明亮”，“確實”等意思。而且這些意思在現代語言中依然常用。如“目的”，“的確”，我們還可以說“的的確確”；“完全了解”，“一目了然”，甚至於說有什麼“了不起”，“這件事讓我替你「了」了吧”。再有就是兒化韻，“本”說成“本兒”，似乎比一個音節多了；“明天”說成“明兒”，似乎又比兩個音節少了。但這是個表達方式的問題（a stylistic problem），而非語言性質的問題^①。因為每一個兒化的詞語，都有一個非兒化的詞語跟它相應，說話的人可以自由選擇。至於北京人說話用兒化韻多，南方人用兒化韻少，這又是方言上的分別。

以上解釋了為甚麼在理論上我們可以用“單音節語”來表示漢語的特性，以下將舉實例來說明以“單音節語”來稱述漢語的適宜性。

一、從語言史上看：《說文》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個字，基本上都是當作單音詞來看待的。古書中確也有雙音詞，但注疏解釋都把它分開來講。例如《爾雅》釋“饑饉”，說“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方言》釋“窈窕”，說“美心為窈，美色曰窕”；《周禮》注釋“果蓏”說“木實為果，草實為蓏”；《說文》釋“陰”為“水之南山之北”，釋“陽”為“山之南水之北”；《淮南子》注釋“宇宙”，說“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甚至於漢譯的《楞嚴經》也說到“世為遷流，界為方位”——這就是現在“世界”一詞之來源。從古人要把複音詞分開解

釋一點看來，就知道“單音節性”是漢語使用者心目中一個基本概念和普通習慣。古書中還有許多“單音節詞”與“複音節詞”併用的例：如《詩·鄘風·牆有茨》、《毛傳》，“茨，蒺藜也”，“蒺藜”正是“茨”的切音。《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則稱“秋，吳子壽夢卒”。“壽夢”也正是“乘”的切音。《左傳》在僖公五年，僖公二十四年，兩次提到“寺人披”（一在重耳出亡前，一在重耳返晉後），到了僖公二十五年則改稱“寺人勃鞞”，“勃鞞”也正是“披”的切音。此外漢語中以兩字切一字之音（或一字合兩字之音）者，多不勝舉。如：“不律謂之筆”，見《爾雅釋器》；“丁寧，鉦也”，見《左傳》宣公四年注。至於一般耳熟能詳的合音詞如：“叵爲不可”，“那爲奈何”，“諸爲之乎或之於”，“旃爲之焉”，以及現代口語中“啥爲甚麼”，“甬爲不用”，“別爲不要”，“兩爲兩人”，乃至現代吳語中“勿要”合成一音，以“勗”表之；勿曾（即未曾）合成一音，以“勗”表之等等，都表示說漢語的人對音節單位有很清楚的意識。又有些“多音節詞”是外語譯音，古代的如“狻猊”，“葡萄”，“菩提”，“三昧”等，近代的如“邏輯”，“沙發”，“可口可樂”等。即從漢譯外語時可將意譯融入音譯之中一端而言，也可看出“漢語音節”的“荷包”裏都有“意義”“財富”，所以才有最高的“購買力”。反過來說“Princeton”譯成漢語時，就成了“普林斯頓”，非由原來的兩個音節增成四個音節不可，也是由於漢語是拿一個個“音節”做單位之故。

二、從文學傳統來看，當我們說“三言詩”，“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雜言詩”時，一言即指一字，也就是一個音節。中國傳統韻文中的“偶句”，婚喪慶吊所用，亭台寺觀所懸，年節及店舖新張時所貼的“聯語”，都要考慮到逐個字（音節）的聲調及義類。倘若漢語沒有“以單音節爲基礎”——簡單地說“單音節”的特性，如何能使其形式這樣整齊，應用這樣普遍？至於文字遊戲中的“猜謎”，“行令”，以及“離合詩”，“建除詩”，“轆轤體詩”，“迴文詩”等，更非以一個個音節爲單位不可了！^⑫除非我們能用別的法子討論詩詞的結構，解釋“近體詩”的格律，講授“對聯”的作法，否則，我們怎能不承認漢語的單音節性呢？

三、最後要從現代人的語言習慣來說了。我們都知道“會議”，“議決”是很普通的“雙音節詞”，但是我們也聽到人說：“會而不議”，“議而不決”。“體操”作爲一個雙音節詞，是“對於身體的操練”或“操練身體”的意思，到底怎麼講要看它是用作名詞還是用作動詞而定。但不管怎樣，這樣的結構，兩個音節不宜分開來用。可是趙元任先生却舉了一句“體了一堂操”的例子。^⑬趙先生稱之爲“假動賓結構的離子化”（Ionization of pseudo-V-O Compounds）。趙先生用化學名詞來表示這一現象，正因爲雙音節詞中的組成音節也像離子一樣有極高的自由度與獨立性。

十餘年前有一位陳太太在普大葛思德東方圖書館（Gest Oriental Library）工

作。她的原籍是上海，說一口上海國語而不時夾雜幾個英語詞（其實我們口頭說，他說話常帶英文字，除了認真討論語文問題時外，字跟詞通常不分）。有一次她和人談起她拜訪另一位朋友，參觀新居後的印象說：“伊啦咯屋裏廂，弄得來邪氣好，清清爽爽，膩膩忒忒（nea-nea-t-t）。這種利用外語創造新詞的本事，即是拜漢語單音節性之賜。

爲了顯示說漢語（國語）的人有根深蒂固的單音化習性，再抄郎雲女士《海外鄉音大觀》中的一段，以爲佐證。^⑨

“金女士：（獨白）唉喲！您瞧哎！這是打那兒說起呀？熬辣瓦薩頓（all of a sudden），這老王啊，告訴說，要娶我……，喲！阿闊兒的禿，誰的定，（accor to 誰的ding according to whom），我非得嫁他呀！哼！就憑他那個德性，還扛我的普累恩，（Com 我的plain，抱怨我），說我熬味兒大黑袖（over the hill，人老珠黃）。瞧哎！我不扛他的就是好的！如今還讓我對他多扛扛西德兒（con-con-sider），哼！他想娶咱金某某啊……不是大奶奶吹的，他老王根本就誇累不夫愛（quali-不-fy）……還讓我扛哪門子西德兒呀（con哪門子sider呀！）。”把英語詞像這樣拆開來用，誰能說不是受了單音節語言習慣的影響呢？

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
於普城

注：

- ① 當然我並不否認“量的範疇”跟“質的範疇”可以有某種相應的關係。但那基本上是一個內部發展變化的過程，而不能用作外在分析判斷的依據。
- ② 這並不是說理化實驗的結果絕對精確。我們講氣體膨脹律時要假定在標準溫度與壓力之下，講物體運動定律時要假定摩擦係數爲零，而這都不是自然世界所有。不過無論如何，統計與實驗之不同是非常明顯的。
- ③ 見《中國語文》一九五五年一月號，頁二五至二八。
- ④ 見《中國語文》一九五五年四月號，頁十三至十七。
- ⑤ 見《中國語文》一九五五年五月號，頁十四至十八。
- ⑥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四分，頁三六三至三九八。
- ⑦ 見《言語研究》第廿二、廿三號（一九五三）。
- ⑧ 載於《民族語文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
- ⑨ 《東觀漢記》卷二十二，只載遠夷樂德歌詩等三首，均以大字著夷語記音，小字註明漢譯，與《後漢書》先出漢譯者不同。兩書記音偶有用字不同處，如“提”之與“堤”，“擇”之與“譯”，“鱗”之與“麟”，均爲同音字，故可不予計較。
- ⑩ 見《中國語文》一九五五年四月號，頁十四，註二。
- ⑪ 用De Saussure的術語來說“兒化韻”是一個關於說話（parole）的問題，“單音節性”是一個關於語言（langue）的問題。
- ⑫ 迴文詩中最簡單的是可以正讀或倒讀的一種。從英語中勉強找個類似的例是托爲拿破崙所說的一

句“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或者設為自問自答的一句“Did I? I`did”。但是像蘇伯玉妻的《盤中詩》，竇滔妻蘇蕙的《迴文詩》（亦稱《織錦迴文璇璣圖詩》），那就非其他語言所能了。即如在一個茶壺上轉圈寫着“可以清心也”五字。這五字又能讀成“以清心也可”，“清心也可以”，“心也可以清”，“也可以清心”。即此也可以為漢語單音節性之一證。

⑬ 見趙著《中國話的文法》英文本第四三二頁。

⑭ 郎雲女士大作原刊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日時報周刊海外版。